

论西周晚期成周的位置及营建背景

侯卫东

关键词：西周晚期 成周 韩旗周城

KEYWORDS: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Chengzhou City Hanqi Zhou City

ABSTRACT: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Chengzhou City located to the north of the Luo River and crossing the Chan River declined and the new city at present-day Hanqi Village was planned and constructed. The burial materials and textual records related to the Luoyang Basin showed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new-built "Chengzhou" City was transferred eastward from the north of Luo River to the present-day Hanqi Village. This new plan and construction had complicated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ost conspicuous problem was that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Xuan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Zhou court was at the climax of the warfar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the Hanqi Zhou City was very probably built in the reign of King Xuan, and the clan of Duke Mu of Shao (Shao Bohu),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preme ministers of King Xuan, migh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hengzhou City.

一、问题的提出

《尚书·召诰》、《洛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逸周书·作雒解》、《史记·周本纪》等早期文献都记载了西周初年在洛阳盆地营建“洛邑”或“成周”的事件，《何尊》^[1]等西周早期金文已经记载“成周”，说明周初确实存在营建“成周”^[2]之事。

李民先生在1982年提出西周的“成周”和“洛邑”是一回事^[3]。叶万松等先生在1984年通过考察洛阳盆地西周时期的考古材料，结合相关文献，把“洛邑城址”的位置指向洛河北岸的“灋河之滨”^[4]，初步提出周初营建的“洛邑”和“成周”为一城。叶万松等先生在1991年重申周初营建的“洛邑”和“成周”为一城，并详细考证其大体

位置在洛河之北的灋河两岸^[5]。张剑先生在1999年更加明确地指出西周早期营建的“洛邑”和“成周”为一城，其位置“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洛水北灋河的两岸”^[6]。梁云先生在2002年提出西周时期的洛邑只有一个城，位于灋水两岸，又叫“成周”；春秋时期敬王之前“成周”与“王城”同指一地，位于涧河东岸^[7]。朱凤瀚先生在2006年对“成周”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也认为周初营建的“洛邑”和“成周”为一城，“具体位置当在涧水东、洛水北岸之灋水东、西两岸”^[8]。2007年，徐昭峰先生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对“成周”和“王城”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也认为西周早期营建的洛邑和成周是一回事，位置在今灋河两岸^[9]。2012年，魏成敏、孙波先生通过对洛阳盆地西周时期材料的分析，进一步论证

作者：侯卫东，开封市，475001，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洛邑成周在灋河两岸的北窑一带^[10]。

通过上述诸位学者的研究，我们认同周初营建的洛邑和成周在一处，位于洛河之北的灋河两岸。根据《洛阳皂角树》^[11]一书和刘建国先生等对洛阳盆地的环境考古研究^[12]，周代之前，最迟仰韶晚期，洛河故道在隋唐洛阳城之南，北距今灋、洛交汇处约5公里，灋河两岸之成周可能部分被现在的洛河占压或冲毁。

刘富良先生认为“成周城的兴盛在西周早、中期，到晚期已经衰落”^[13]。这是根据洛阳西周时期的陶器墓得出的认识，并以遗址相验证，基于普通墓葬为代表的基层社会的材料。以铜器墓为代表的贵族阶层最能反映“成周”作为都邑的兴衰，以它们为研究对象得出的认识，是否与前述认识合拍呢？

查考洛阳盆地历年发表的西周时期墓葬材料，属于西周早期或中期的铜器墓主要有下面几处。集中分布的为北窑M1、M6、M37、M347、M418、M686、M701、M112、M299、M368、M385、M389、M410、M452等^[14]，比较零散的有老城北大街C2M130^[15]、洛阳机车工厂托儿所M13^[16]、唐城花园C3M417^[17]、中窑村C3M575^[18]、洛阳东车站M567^[19]、钢铁厂西周墓^[20]、五女冢M1505、M1519^[21]、涧滨AM21^[22]等。上述墓葬中，依叶万松、朱凤瀚、徐昭峰等先生所划“成周”的范围，钢铁厂西周墓在东方，距离“成周”最远，北大街C2M130，五女冢M1505、M1519，涧滨AM21在西方，距离稍远，其余都在“成周”之内或附近。传洛阳马坡出土的“令方彝”^[23]应代表了一座高规格铜器墓，马坡一带在“成周”之北，距离较近。

西周晚期的铜器墓主要有北窑M68、M501^[24]，盛世唐庄C1M8633^[25]，洛阳东郊C5M906^[26]，洛阳东郊C5M1135^[27]，白马寺M1、M21^[28]等。北窑M68、M501为代表的墓地紧邻“成周”，白马寺M1、M21距离较

远，其余与“成周”也有一些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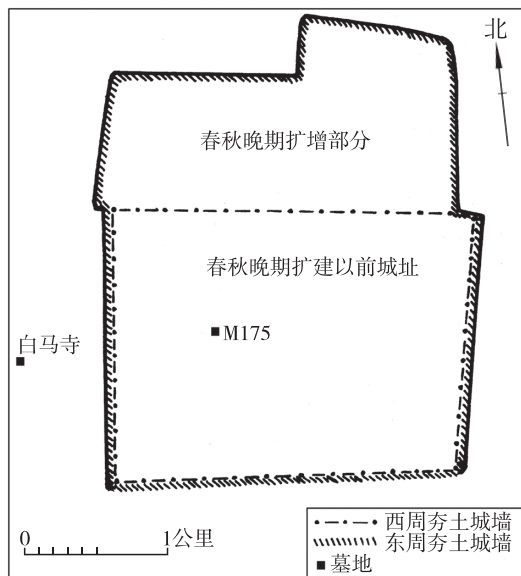
西周早、中期铜器墓比较多，并且大多在灋河之“成周”附近，而同期陶器墓也较多；西周晚期铜器墓很少，且与灋河之“成周”也更加离散，同期陶器墓也较少。单就北窑墓地而言，可以分期的西周铜器墓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依次递减，与陶器墓数量变化合拍。可见，洛阳西周的铜器墓与陶器墓共同反映了灋河之“成周”的兴衰。此外，洛阳东郊C5M906为代表的杨文墓地和东方更远的白马寺墓地表明西周晚期贵族有东移的趋势。西周晚期，灋河之“成周”从考古学层面上已经失去早中期的地位，功能应该发生了变化。

二、西周晚期成周城的位置

洛阳盆地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中，寻找西周城邑是重要学术目标。迄今发现年代可推断为西周时期的城邑仅有汉魏洛阳城下压的韩旗周城^[29]（图一）。根据试掘报告，该城在春秋晚期和春秋晚期之前有两次大的修建。

学界对韩旗周城春秋晚期扩增后的年代和性质意见非常一致，认为是《春秋》经、传记载的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城成周”的反映，该城是周敬王以来周王所居的“成周”城。但对春秋晚期扩建以前城址的建筑年代和性质却有很大的分歧，试掘报告认为该城“原筑夯土”的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晚期，与周初营建成周的关系应引起重视；段鹏琦先生称该城为雒邑成周之外的西周城^[30]；梁云先生认为该城始建于春秋早期或两周之际，是周平王东迁之后修建的驻扎诸侯国军队的“翟泉”城^[31]；徐昭峰先生认为该城始建于西周晚期，城名为“周”^[32]；魏成敏、孙波先生否定其为周初成周的可能性^[33]。

本文赞同春秋晚期扩增之后的韩旗周城为周敬王以来的成周城。春秋晚期扩建以前的韩旗周城年代可能推到西周晚期，是规模



图一 西周晚期成周平面示意图

较大、规格较高的城邑聚落。在灋河之“成周”衰落的西周晚期，最初营建的韩旗周城或许从西周晚期就是新的“成周城”。下面通过分析城址与周围遗存的关系、对比同时期相关的城址，结合西周金文和可信的传世文献，讨论韩旗周城与西周晚期以来成周城的关系。

春秋晚期扩建以前的城址平面为横长方形，北、东、南、西四面城墙分别长约2600、1800、2400、1940米。夯土中未见晚于春秋早期的遗物，其包含物的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城墙的年代上限应为西周晚期。城址中西部发现西周晚期铜器墓M175及相关墓葬^[34]，白马寺西周晚期墓地位于城址西约500米处，刘富良先生指出汉魏故城一带发现少量西周陶片，特征属于西周晚期^[35]。城内及附近有西周晚期高规格墓地和西周晚期遗物，说明该城代表的聚落体系在西周晚期已经使用，但尚无将其使用年代前推的依据。

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周文化系统的城址主要有北京琉璃河董家林燕国城址^[36]、山东曲阜鲁国城址^[37]、高青陈庄齐国城址^[38]等。董家林燕国城址南部破坏比较严重，难以作为比较对象。陈庄齐国城址面积不足4万平

方米，规模与洛阳春秋晚期扩建之前的城址相差太远，但从前者城址平面图来看，其南、北城墙略长于东、西城墙。曲阜鲁国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城墙保存最好的西周城址，平面为横长方形，北、东、南、西四面城墙分别长约3560、2531、3250、2430米，规模也和洛阳春秋晚期扩建之前的城址接近。可以确定曲阜鲁城在西周晚期进行过一次修建，推测该城的始建年代可能更早。根据《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国是西周封国中与周王朝最亲近的诸侯国，也是最遵循周王朝礼制的国家。因此，曲阜鲁城的形制至少代表了西周晚期周文化系统都邑的标准。曲阜鲁城宽与长之比为： $(2531+2430) / (3560+3250) \approx 0.73$ ；韩旗周城春秋晚期扩建以前的城址宽与长之比为： $(1800+1940) / (2600+2400) \approx 0.75$ 。两者都为横长方形，宽长比又相近，前者城墙内包含物的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说明二者年代相近，前者的年代很可能也为西周晚期。

从形制、最早原筑城墙的包含物、城址代表的聚落体系以及洛阳盆地西周晚期文化东移的趋势来看，韩旗周城春秋晚期扩建以前的城址始建年代无疑为西周晚期。原筑城墙内包含物有西周晚期特征，筑城年代应与包含物代表的时间相同或略晚，可能是西周晚期后段。

春秋晚期扩建后，该城为周敬王以来的“成周”城，循着此时的“成周”城之名向上追溯，并参考可信的早期文献^[39]，我们可以探讨该城的性质。

春秋时期提到“成周”的文献，最多、最可信的就是《春秋》经、传了。左氏《春秋》经、传提到“成周”的如下。《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郑国“又取成周之禾”。《左传·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天王入于成周”。《春秋·昭

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秋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这些文献说明周敬王时期在原来成周城的基础上扩建，“城成周”是当时的大事，《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谷梁传·昭公三十二年》也都有记载。《春秋》经、三传非常重视记载修建城邑的事，《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第一次记载“成周”到周敬王时期“城成周”之前，《春秋》经、传都没有关于修建成周的记载，说明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至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间成周没有进行大规模修建，所言“成周”为一处，就是韩旗周城。

《春秋·宣公十六年》公羊和谷梁经曰：“夏，成周宣谢灾”，左经曰：“夏，成周宣榭火”，公羊传：“宣谢者何？宣宫之谢也”。说明此“成周”有宣王时期的建筑，宣王以来“成周”的位置没变，这与韩旗周城的始建年代相合，该城的年代上限至少能到周宣王时期。《竹书纪年》记载：“（平王）元年辛未，王东徙洛邑，赐文侯命。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40]，说明平王东迁之前存在一个“成周”，从文献上能够把宣王时期的成周和《春秋》经、传提到的成周连接起来。如此，则西周初年始建之成周（洛邑）与宣王以来的成周城就不是一处了，后者是前者衰落后营建的。

西周晚期灋河之成周的衰落、韩旗成周城的始建以及灋河两岸北窑墓地代表的不少西周晚期贵族墓葬，说明并不是简单的一衰一兴。“灋河之成周”在西周晚期的衰落，并不代表宗庙^[41]也东迁或拆除了，春秋早期，在“灋河之成周”西方不远的涧河之东

营建周王所居“王城”^[42]，证明平王东迁前这一带仍是宗庙所在，是周王室的“神圣地带”。因此，西周晚期成周的宗庙仍然在灋河一带，成周城迁建至汉魏洛阳城一带，春秋早期以来“王城”和“成周”显然是同时的两座城。

关于春秋早期以来“成周”和“王城”的关系，最可信的是《春秋》经、传。《公羊传》最早明确指出“成周”和“王城”为两地，《公羊传·宣公十六年》、《昭公二十六年》都记载：“成周者何？东周也”，《昭公二十二年》说：“王城者何？西周也”。《汉书·地理志》把“成周”和“王城”作为两地，分别指认为西汉雒阳县与河南县。西晋初年杜预也把二者作为两地，《左传·隐公三年》载：郑国“又取成周之禾”，杜预注：“成周，洛阳县”；《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载：“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杜预注：“王城，郑郟，今河南县”。公羊、班固和杜预都把“成周”和“王城”作为两地，这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王城”是“成周”的内城^[43]；近年有学者赞同这种看法并进一步指出“王城”和“成周”是周敬王前的春秋时期对涧河东岸同一都城的两种称呼，周敬王时期才分为两地^[44]。

《春秋》经、传中周敬王之前的“王城”和“成周”是两地还是一地，最重要的首先是解读原文《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说明“王城”是“京师”的一个地点。《春秋》经、传中记载诸侯或其使臣到周都，均表述为“如京师”^[45]，王后、王子等王室成员回到周都均表述为“归于京师”^[46]，诸侯、他国国君或大夫到周都也表述为“归于京师”^[47]，可见“京师”是春秋时期周都的统称；周王、王子或外敌进入“王城”或“成周”，分别表述为“入于王城”、“入王城”^[48]或“入于成周”^[49]，

说明他们进入的是具体地点是“王城”或“成周”。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左传·定公七年》：“（十一月）己巳，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说明平宫（周平王宗庙）和庄宫（周庄王宗庙）在王城内，而王城在春秋早期已经是周王所居的都邑。有学者以为“庄宫”同在“王城”和“成周”，从而推论二者为一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上引《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和《定公七年》能够说明平宫和庄宫在王城内，在于人物在“王城、平宫”或“王城、庄宫”的活动是短时间内连续的，而《昭公二十六年》所记载“王入于庄宫”已经在“王入于成周”十天之后，并不能说明庄宫在成周内。因此，“庄宫”并不能把“王城”和“成周”联结为一地。

再者，如果“王城”和“成周”为一地，就会出现矛盾。第一，如果涧河东岸的周代城址是“王城”和“成周”，据上文所论春秋时期的“成周”城至少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而涧河东岸周代城址的年代上限为春秋早期。第二，春秋早中期涧河东岸周代城址遗存的高规格远超过韩旗周城，表明此时前者有都邑的性质而后者没有，把“王城”和“成周”都指认到后者显然不合适。

综上，春秋早期以来的“王城”和“成周”为两地，“王城”为春秋平王至敬王之前的都邑。西周宣王以来的“成周”即韩旗周城，学界多认为其主要功能是军事方面^[50]，本文认同此说。由于平王、庄王等春秋早中期诸王的宗庙在“王城”内，西周晚期宗庙也应在灋河一带，则宣王至敬王时期的

“成周”城不是具有宗法和政治意义“王都”^[51]。

三、西周晚期营建“成周”城的历史背景

成王营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52]或称“东部的行政中心”^[53]，西周早期金文和洛阳西周早中期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成周”为周王朝的重要都邑，《尚书》、《逸周书》、《史记》等早期文献也记载了“成周”在征服东方，管理“天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上文结合考古材料、西周金文和《春秋》经、传，提出西周晚期“成周”城东移至汉魏洛阳城一带。重新营建“成周”城是周王朝的大事，其历史背景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重新营建“成周”城的原因，还会帮助理解其年代和性质。

西周晚期的金文反映周王室与“成周”东南方的淮夷（也称“南淮夷”）战争频繁，如厉王时期的《生盃》载：“王征南淮夷”^[54]。淮夷甚至有时逼近“成周”，厉王时期的《敌簋》记载南淮夷内伐至伊、洛之间，当时“王在成周”^[55]。西周晚期的金文也反映出周王室和宗周西北方的玁狁有较大战争，如：宣王时期的《兮甲盘》载：“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56]，《虢季子白盘》记载子白“薄伐玁狁，于洛之阳”^[57]等。西周晚期，周王室处于东西两线防御作战的状态，厉王时期战争压力加大，宣王早期更达到高峰^[58]。

此种艰难背景下，宣王时期有很多建城事件。《诗·大雅·崧高》记载周王命令召伯（虎）帮助申伯建城，《诗·大雅·韩奕》记载“燕师”帮助韩侯建城，《诗·大雅·烝民》记载周王命令仲山甫帮助齐国建城^[59]，《诗·小雅·出车》记载周王命令南仲到“方”建城。宣王时期的建城是对四方

的布防，这对理解重新营建“成周”城大有帮助。在受到淮夷严重威胁的“成周”地区建城，也属于大势所趋。因此，结合韩旗周城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晚期（倾向于后段）、城内有宣王时期的建筑，我们甚至可以把该城的始建年代推断为宣王时期。《竹书纪年》记载：成王七年营建成周之后“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宣王“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宣王也很可能如成王一样在重新营建的“成周”朝会诸侯。

西周晚期重新营建“成周”城，还应当提到厉宣时期重要的卿士召穆公（召虎、召伯虎）。根据宣王时期金文《五年琿生簋》、《五年琿生尊》、《六年琿生簋》^[60]以及《诗·大雅·江汉》的记载，召穆公（召虎、召伯虎）是召公奭（召康公）的后代，并且是召氏宗君，在宣王时期具有很高的地位^[61]。北窑墓地西周早期墓葬M161出土“太保”铭文铜戈，M374出土“叔造作召公宗宝尊彝”铭文铜尊，朱凤瀚先生指出两墓墓主应为召公宗族成员^[62]，说明召公宗族的一支西周早期葬在成周，显然也应生活在成周。北窑墓地东北约3公里的洛阳东郊西周晚期墓C5M906出土1件铭文为“召伯虎作朕文考”的铜盃^[63]，墓主也应是召氏宗族成员，并与召伯虎有很重要的关系。《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富辰的追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可见，整个西周时期召氏宗族都有一支生活在“成周”地区。《尚书·召诰》记载召公（召康公）营建洛邑，提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诗·大雅·崧高》记载召穆公（召伯虎）受宣王之命帮助申伯建国，“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之语和《洛诰》相似，说明召康公、召穆公都有“相宅”或“定宅”的本领。结合召穆公宗族一支生活于成周，召穆公（召伯虎）或其宗族应该参与了宣王时期重新营建“成周”城的活动。

上述各种信息把西周晚期重新营建“成周”城的时间指向宣王时期。宣王时期在战争压力下四处建城进行防御，重新营建“成周”城显然为了加强东方的安全，其军事上的防御性加强是一个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宣王五年的《兮甲盘》记载周王命令兮甲负责“成周四方”的赋收，特别提到如果淮夷不纳赋就可以征伐^[64]。可见，宣王时期通过“成周”管理淮夷，并包含强烈的武力因素，与成王和周公东征后“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西周早期相比，“自之义民”的能力大大减弱。因此，“成周”由西周早期军事上镇抚东方转变为西周晚期的防御东方，其行政管理效率也随之大大降低。

春秋早期在周初“成周”的西南方重新营建“王城”，也可证略早于春秋“王城”的西周晚期“成周”城在敬王之前的春秋时期，主要功能在军事。直到敬王时期扩建之后，行政才成为主要功能。

四、结 语

始建“成周”是周王朝早期统治“天下”的重要战略，该城在西周早中期是两个行政中心之一，在管理“天下”的功能上甚至强于“宗周”，并兼有军事上镇抚东方的作用。随着“天下”形势的变化，西周晚期重建“成周”城，从洛河之北的灋河两岸东移至汉魏洛阳城一带，其管理“天下”的行政功能减弱，军事防御功能加强。西周晚期重新营建“成周”城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65]，最突出的就是周王朝处于东、西方战争的高峰。韩旗周城的始建年代很可能是宣王时期，宣王最重要的卿士召穆公（召伯虎）的宗族可能参与了“成周”城的重新营建。平王以来的东周时期，“成周”城位置一直未变，春秋早期在涧河一带修建的“王城”是周王朝政治中心。“成周”城当时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敬王扩建之后才成为周王朝的政治中心。

注 释

- [1]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 [2] 《尚书·召诰》、《洛诰》称为“新邑”。
- [3] 李民：《说洛邑、成周与王城》，《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1期。
- [4] 叶万松、余扶危：《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编辑部，1984年。
- [5] 叶万松、张剑、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 [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 [7] 梁云：《成周与王城考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 [8] 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9] 徐昭峰：《成周与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第11期。
- [10] 魏成敏、孙波：《汉魏洛阳西周城与西周洛邑探索》，见《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
- [12] 刘建国、张蕾：《遥感与GIS支持的洛阳盆地聚落与环境研究》，见《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3] 刘富良：《洛阳西周陶器墓研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该文也指出西周“成周”在洛河北的瀍河两岸。
- [14] 同[6]。本文仅列举该书发表的一部分。
- [1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老城北大街西周墓》，《文物》2010年第8期。
- [16] 张剑、蔡运章：《洛阳东郊13号西周墓的发掘》，《文物》1998年第10期。
- [1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唐城花园C3M417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7期。
- [1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瀍河东岸西周墓的发掘》，《文物》2006年第3期。
- [1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车站两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2期。
- [20] 傅永魁：《洛阳东郊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 [2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五女冢西周早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0期。
- [22] 梁晓景、马三鸿：《洛阳涧滨AM21西周墓》，《文物》1999年第9期。
- [23]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35、36页，中华书局，2004年。
- [24] 同[6]。本文仅列举该书发表的一部分，根据报告，西周晚期铜器墓比西周早期和晚期都大量减少。
- [2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涧河东岸西周晚期墓》，《文物》2007年第9期。
- [2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郊C5M906号西周墓》，《考古》1995年第9期。
- [27] 同[16]。
- [28] 张剑、蔡运章：《洛阳白马寺三座西周晚期墓》，《文物》1998年第10期。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该文报道的汉魏洛阳城下压的西周城址，现在一般称为“韩旗西周城址”，由于该城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扩建沿用，本文称之为“韩旗周城”。
- [30]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 [31] 同[7]。
- [32] 同[9]。
- [33] 魏成敏、孙波：《汉魏洛阳西周城与西周洛邑探索》，见《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M175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3期。
- [35] 同[13]。该文注52中称“笔者所见资料”。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汉魏洛阳城附近调查到很多两周时期遗存，由于调查简报没有对两周遗存进行更详细的分期，我们无法知道西周早中期和晚期遗存的分布情况，也就无法采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

- 究所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0年第1期。
- [3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 [3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2期。
- [39] 使用的文献为西周金文以及《尚书》、《诗》、《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的相关章节，其可信性参看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和地理危机》第12~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40] 《尚书》有《文侯之命》，结合《左传·隐公六年》、《国语·郑语》、《书序》的记载，《竹书纪年》这条记载比较可信。
- [41] 同[8]。该文统计了“灋河之成周”的几座宗庙，可参考。
- [42] a. 同[7]。
b. 同[9]。
- [43]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44] a. 同[7]。
b. 同[9]。
- [45] 《春秋》：僖公三十年、文公元年、八年、九年、宣公九年、成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昭公二十二年。《左传》：成公十三年、襄公五年、昭公三十二年、哀公十九年。
- [46] 《春秋》：桓公九年，《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僖公二十二年。
- [47] 《春秋》：成公十五年。《左传》：庄公三十年。
- [48]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左传》：僖公十一年、昭公二十三年、定公七年，《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
- [49] 《春秋》：昭公二十六年。
- [50] a. 同[13]。该文指出西周晚期金文中的“成周”都是作为战争的指挥所，可参考。
b. 同[7]。该文提出该城在敬王之前的春秋时期为诸侯驻扎军队的地方，可帮助理解其军事性质。
- [51]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 [52] 同[8]。该文对成王营建“成周”的性质作了系统讨论，可参阅。
- [53]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和地理危机》第74~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54] 张懋镕：《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把生盨定为厉王器。《殷周金文集成》4459著录铭文。
- [55] a.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该书把敌簋定为厉王器。
b.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229~231页，中华书局，2004年。该书指出“南淮夷内伐至豫境伊、洛之间”。
- [56]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23~326页，中华书局，2004年。
- [57]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27~330页，中华书局，2004年。
- [58]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和地理危机》第120~122页、157~159页、171~2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该书对西周晚期周王朝和玁狁、淮夷两线战争的严重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 [59] 《竹书纪年》载：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可互证。
- [60] 王辉：《珣生三器考释》，《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关于珣生三器的年代和召伯虎的身份地位，从该文。
- [61] 《竹书纪年》记载：厉王二十六年“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宣王元年“周定公、召穆公辅政”。结合金文和《诗》的记载，召穆公（召伯虎）在宣王时期地位很高，类似成王时期的周公旦、召公奭。
- [62] 朱凤瀚：《商周家祖形态》（增订本）第628~63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 [63] 同[26]。
- [64]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23~326页，中华书局，2004年。
- [65]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和地理危机》第106~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该书对西周晚期的复杂政治军事背景作了很详细的叙述。

（责任编辑 付兵兵）